

CHINA·USA

新的视野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中美关系史丛书·论丛



·3·

中美关系史丛书
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美关系史丛书·论丛

新的视野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

南 京 大 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南京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

主 编 丁名楠
编 委 乔明顺 邓蜀生 罗荣渠
张振鹗 资中筠 陶文钊
秘 书 高士华

新的视野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

南 京 大 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5千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305-00980-8/D·128

定价: 5.50元

60453107

前 言

呈现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新的视野》，乃是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第一辑出版于1985年，内容是从中美正式建交的1978年底到1984年初国内公开发表的论述中美关系史的100多篇论文中挑选出的15篇。第二辑出版于1988年，共22篇，选自提交给1985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第一、二两辑均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988年7月25日至29日，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主办的全国第二次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心举行。与会的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及研究单位的学者70余人，主题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现在从中选出17篇，编成第三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

相当的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美交往中的侵略与反侵略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映了中美关系一百多年来的基本事实。并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强烈愿望。它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正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们解放思想，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外关系，把我们的学术水平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本辑是由陶文钊、沈宗美和蔡佳禾三同志负责编审的。例承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的一贯宗旨，所收论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本书早在1988年12月就已编审完毕，由于出版经费方面的困难，迟至今日才得以问世，敬希读者和论文作者给予谅解。

王志刚

1990年9月15日于南京大学—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前 言	王志刚 (1)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梁碧莹 (1)
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	徐鲁航 (21)
美国宪法对孙中山的主要影响	李庆余 (33)
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兼议“精英”舆论	袁 明 (44)
《中美航空密约》辨析	郑会欣 (58)
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	
——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	何 迪 (69)
美国在华空军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顾学稼 姚 波 (91)
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	刘景修 张克明 (111)
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及其意义评析	王 淇 (129)
试论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任东来 (144)
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	牛 军 (166)
试评新中国成立前后艾奇逊的对华政策	
高明振 林利民 (191)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时殷弘 (209)
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田金星 (229)
“放蒋出笼”与美国的远东新战略	蔡佳禾 (253)
简析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	贾庆国 (270)
中美关系史研究十年回顾	陶文钊 (282)
本书作者简介	(308)

CONTENTS

Foreword Wang Zhigang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 China's Cultural Con-
tacts with the West

Liang Biying

Major Impact of the Returned Chinese Students Educated
in America with Funds of the Boxer Indemnities

Xu Luhang

Influence of U.S. Constitution on Dr. Sun Yat-sen

Li Qingyu

China's Image in America: The Elitist Views

Yuan Ming

A Probe into the Alleged Secret China-U.S. Aviation Treaty

Zheng Huixin

An American Missionary's Dream: John L. Stuart's Media-
tion in the Sino-Japanese Peace Talks

He Di

U.S. Air Forc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u Xuejia

Yao Bo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iu Jingxiu

Zhang Keming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FOR
RELINQUISHMENT OF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IN CHINA, 1943**

Wang Qi

**On 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946**

Ren Donglai

**George Marsall's Mediation and the Civil war in Northeast
China**

Nu Jun

**Dean Acheson's China Policy Immediat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Gao Mingzhen

Lin Limin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Shi Yinhong

U.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orean War

Tian Jiaxing

**"Unleashing Chiang" and the U.S. New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Cai Jiah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Jia Qingguo

Sino-U.S. Relations Studies: The Past Decade in Retrospect

Tao Wenzhao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梁碧莹

内 容 提 要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学校、翻译西书、出版书籍、创办书刊等方面文化活动的考察，探讨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各种层次的教会学校，进行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这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

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书籍和办报的活动异常活跃。19世纪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传教士所掌握。西书的译刊和传播，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且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主办的报刊，内容丰富，领域宽广，对中外文化的沟通和推动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美国传教士的文化活动，适应了西学东

渐的潮流，客观上起了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当然，由于他们的活动以在中国传教为依托以及当时特定的中外历史条件，他们在中国所办的教育、文化事业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消极性和局限性。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 19 世纪初叶。鸦片战争前，近代西方文化就已开始由传教士带到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接触并不是以平等的文化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苦痛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的。

信奉新教的美国传教士也在 19 世纪 30 年代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830 年 2 月，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作为第一个从美国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抵达广州，随同来华的还有美国传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继而，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和伯驾 (Peter Parker) 也于 1833 年和 1834 年先后来到广州。他们成了第一批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此后，大批美国传教士也不远万里而来。他们在华的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他们也就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

对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学术界看法历来不一。

来华传教士比较复杂。其中有真正的基督教徒，他们以传教为职志；但也有一些奉本国殖民主义者的使命来华，他们在中国以传教作掩护进行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侵略活动。本文不可能全面阐述传教士在中国的全部活动，只拟通过对 19 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的某些方面进行一些具体考察，以图说明他们在中

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美国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的福音传播方式难以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加快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他们率先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通过学校传播基督教义，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从事的重要文化活动。正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所说：“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宁波教会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归主，建立分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我们所办的学校。”^①

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1830年2月由裨治文在广州设立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四五名学生，并且举办不久便关闭了^②，论影响并不大，但它毕竟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

1836年，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马礼逊教育会是由寓居广州的英、美等国外侨倡议，由美商奥立芬(D. W. C. Olyphant)赞助组织起来的，英国大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任主席，裨治文任秘书。该会具有商办教育的性质，但由于裨治文任秘书，又明显地具有办学校同传教结合起来的倾向。马礼逊教育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除要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这些学

① 溪尔恩《在山东前线》第227页，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②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7页。

校还将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①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英、美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美国耶鲁大学马上作出反应，派该校毕业生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来华办学，经费由马礼逊教育会提供。

马礼逊学堂于1839年正式在澳门开学，首批学生六人，1842年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②。马礼逊学堂课程的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汉语。除汉语由一位中国先生任教外，其他各门课程皆由布朗夫妇执教。布朗不仅向学生灌输各种新的西方知识，而且还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等人赴美深造的促成者。1847年布朗夫妇回国时，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随同赴美，在布朗和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芸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学生，1854年学成回国。黄宽在美国学习两年后，赴英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名留英学生和中国第一位西医的传播者，1857年回国后，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并培养中国第一代西医。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学校逐渐增多。传教士在宁波首创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又在宁波创办寄宿男生学校，并将宁波方言“罗马化”。同年，美国长老会又在澳门开设寄宿学校，后移至广州。1847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州创办男生学校，四年后增设女子学校。1850年美国圣公会又在上海办学校^③。

1868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④。有了条约的保证，美国传教士便更积极地在中国各地设立学堂。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December 1836), p. 374.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③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237页。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3页。

又由于自 19 世纪下半期起,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在国外宣教的热潮,号召美国青年到海外传教。因此,美国一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传教士就在这一时期纷纷来华,致使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据统计,到 1898 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 155 个教会,849 个分会,40027 名中国教徒,1032 所初等学校,有学生 16310 人;有 74 所中等以上的学校,拥有学生 3819 人^①。

19 世纪下半期,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有: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1876 年改称文会馆);1865 年圣公会在上海开设的培雅学堂,第二年设立的度恩学堂(1879 年两校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 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71 年圣公会在武昌开设的文惠廉纪念学堂;1881 年监理会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后发展为东吴大学);1882 年长老会在山东开设的广文学堂(后发展为齐鲁大学);1889 年长老会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后发展为岭南大学);1888 年美以美教派在北京开设的汇文书院,1889 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开设的华北协和书院(后两校合并为燕京大学)^②。此外,传教士还开办女子学校,主要有北京贝满女学(1864)、上海圣玛利女学(1881),广州真光女学(1881)以及上海中西女学等等^③。

整个 19 世纪,美国传教士创办的这些学校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完备系列,有小学、中学,甚至有几所初创的大学。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充当职业教师。大多数学校位于城市。招生的对象开始时以贫苦孩子为主,到了 19 世纪末,多数教会学校都以吸收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或其他富家子弟入学为主。

移植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教会学校在其建立和发展的同时,

①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4 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7—228 页;《中国近代教育史》第 74—75 页;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43 页。

③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621—622 页。

与清朝固有的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朝，读书人必须习作八股文来应付科举，以求进身之道。在“学而优则仕”，以及“义理、考据、辞章”等训诂、考据学风的禁锢下，不少学生只知读书，不知人间烟火，学校死水一潭。教会学校的建立给这种弊端丛生的封闭型传统教育带来了西方开放型教育的冲击和挑战。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传教士推行的外来教育和文化不仅没有能使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全盘西化，反而被具有强大同化力的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所吸收和借鉴，东方型的教育习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依旧保持了下來。然而教会学校的创办，对中国教育界所起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教会学校宣传和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新学与旧学相比，新学的确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新学不仅教人以科学，也鼓励掌握科学的人参预社会竞争。这在中国引起人们对新学的兴趣。一批初步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随之成长起来。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比如上文提到的布朗先生，就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的美国人。他认为中国的教科书极少介绍科学知识，中国的学堂“把科学排斥在外，使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①。他在马礼逊学堂所授的西方知识课程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还开过化学课。这所学校传授的知识，远比当时的私塾丰富得多。又如，在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81年于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里，八年的西学课程循序渐进，高年级的科学课程有化学、重分、微分、积分，还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等。189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December, 1844), pp. 631—634.

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①。无论教会学校开设西学的目的何在，教会学校事实上也曾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又在教会学校中掌握了英语，这些人在洋务企业中充当政府官员的译员、外国贸易公司的职员或代理人，有的还在中国海关、邮局、铁路等部门供职，对中国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美国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教会学校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逐渐为中国所接受。1862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所中国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开始教育改革的主要标志。次年，在上海开设上海同文馆（亦称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又开设了广州同文馆（亦称广州方言馆），以后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学校和军事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有许多都仿效教会学校。有些学校还聘任传教士担任教习或总教习。据统计，同文馆的外籍教习在1862—1884年间多达20余人^②，除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任算学教习外，其余课程皆聘请英、美、法传教士任教。这样，中国官办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西学的阵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am A. Martin）在京师同文馆任教期间拟订八年课程计划，规定最初三年注重各国语文的学习和西洋史地的讲授；第四五年专习数学；第六年专习力学、微积分和航海学；第七年习天文、地质和矿物诸学；第八年则习政治经济和国际法等学。为了使学生增加感性知识，丁韪良还从美国购运小型电报收发机两部，用莫氏电码在馆内表演电力收发讯息之便捷，并邀请总理衙门官员参观。在座的人目覩铜线两端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295页。

② 丁韪良《同文馆记》，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1页。

接触，发光有声；手按电钮铃声作响，不禁相视惊奇^①。除中央外，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私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程式也仿效教会学校。

美国传教士还直接鼓吹改革中国教育。他们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而且撰文强调要振兴中国教育就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例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 (Gilbert Reid) 在拜会恭亲王时，曾面呈《创设学校议》一文，文中首论学校的重要，并介绍新学的种类，设立新学的方法，进而提出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的建议^②。狄考文发表《振兴学校论》的文章，批评中国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窄，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主张广设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开办大学和女学，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纳于学。他还主张向清朝政府建议取消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学校授予学位的办法，鼓励学生竞争，努力学习，同时提出取消八股文，增加教授新科目、新内容等主张。林乐知利用他主办《万国公报》的有利条件，发表了许多议论中国教育文章。文章涉及范围广泛，有的批评中国教育制度阻碍人才的成长，有的建议中国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学，有的主张社会重视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给女孩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当时女校的发展同传教士的鼓吹是分不开的。例如，在 1896 年全国 1100 所教会学校中有 300 所是女校，在 21300 名学生中有 6800 名是女生。同年，由西方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成立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积极鼓吹中国教育改革。该会推举林乐知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李佳白起草《改革中国考试制度议》等文。1898 年，狄考文把《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呈送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重视教育，改革教学内容^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对当时中国

① 姚嵩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30 页。

② 李佳白《创设学校议》，见《万国公报》第 7 卷 (1895) 第 84 期第 4—5 页。

③ 狄考文《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见《万国公报》第 9 卷 (1897) 第 100 期第 7—9 页、第 101 期第 4—5 页。

的教育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八股、停科举、开新学，这些虽是为适应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清政府做到这一步，与传教士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当然，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的总目的是为了传教。因此，教会学校带来的西方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和知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同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虽然包含有西方的文明，但也有相当多的糟粕。有些人便不分良莠，主张一律吸收，统统“拿来”，“全盘西化”。这种“拿来”与中国国情不符，“全盘西化”当然化不起来。尽管如此，教会学校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二)

翻译和出版书籍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早在1834年11月，广州外侨成立了名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组织，裨治文是该会的秘书。该会标榜的主要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措施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并声明要使中国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用知识使西方取得“胜利的棕榈枝”^①。1835年10月，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广州举行第一届年会。但是，这个学术性质的组织成效甚微，它的活动仅限于开了几次会议，制订一些计划。

1838年，裨治文撰写一部名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书，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情况。全书分两帙，上帙叙述美国大略，下帙评述美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书中还常常把中美两国的情况作比较。该书对美国政治制度来源、组织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December, 1834), pp. 378—384.

与功能的介绍成为以后三四十年间中国人了解美国情况的主要来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增补的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三分之二来自这部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美国的专著，书中的资料也以这本书为主要依据。该书初版时署名高理文，后经修订，书名改称《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第三版出版时又更名为《联邦志略》，署名裨治文。

1839年，林则徐出于同英国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需要，组织人员选择瑞士人瓦达尔（De Vattel）1785年编著的《各国律例》（全名是《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林则徐委托当时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一起同马礼逊学堂的毕业生袁德辉摘译此书。他们选译了《各国律例》中关于宣布违禁外货、扣押犯禁外国船只、封锁港口、宣布战争等内容，后来载入魏源所辑的《海国图志》。这是国际法被介绍到中国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随着传教士大批来华，翻译和出版事业日趋活跃。这当中美国传教士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世纪在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传教士所操纵。其中主要机构有三家：一是丁韪良主持的京师同文馆。它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翻译机构，非常注重学生的译书训练。在其馆规中规定，学生在八年的学习期间的最后两年，必须译书^①。在馆的教习也多有译著^②。二是江南制造局（1865年成立）1867年成立的翻译馆。它出版了一些科技著作，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这两家是清政府官办、长期聘用传教士担任翻译工作的机构。三是广学会（1887年成立）。它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初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为该会的主要成员。广学会除出版宗教和政治书籍外，还出版大批西方科学著作，数

①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页。

②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3页。